

# 没有英雄的底层:《来生再见》的反战叙事

刘虹利

(西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大陆当代主流文学对抗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和国军抗战历史的反映并不充分,何顿的长篇小说《来生再见》正面直视国军抗日的历史,记录国军在湖南与日本侵略者的具体战斗过程,有效地抵抗了现实生活与文学创作中的集体遗忘。作品讲述了一个国军下级军官的一生,通过对主人公底层农民身份的还原,突破了战争小说常见的成长模式,在嵌套式结构形成的张力中推进“反英雄”式的叙述,触目惊心揭示战争的残酷,有力地表达了鲜明的反战立场。

**[关键词]**《来生再见》;身份还原;底层书写;反英雄;反战叙事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6)04-0012-05

## No Heroes at the Bottom: the Anti-War Narrative of *See You Next Life*

LIU Hongli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u, 610041 China)

**Abstract:** In mainland China, contemporary mainstream literature is lack of works about frontal battlefield in Anti-Japanese War, and the reflection on the history about Kuomintang army fighting against the Japanese is not sufficient. Hedun's novel *See You Next Life* faced the history about KMT Army against the Japanese, recorded the specific courses of battles against Japanese invaders in Hunan province, those of which effectively resisted the collective oblivion in both reality and literature. The novel told a story about a KMT junior officer's lifetime. By reducing the identity of the protagonist to farmer at the bottom of society, the writer broke the common growth patterns of war novels, and used nested structure to form the tension and promote the anti-hero narrative, which contributed to reveal the shocking cruelty of war, and expressed sharp anti-war position forcefully.

**Key words:** *See You Next Life*; identity reduction; bottom writing; anti-hero; anti-war narrative

2016年3月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CBA总决赛,一支名不见经传的四川球队打败了辽宁队获得了总冠军。对于这支没有一名四川球员、外援多达三名的球队,辽宁球迷在网络论战中大加挞伐,而四川球迷也不肯服输,由于球员结构是无法改变的“硬伤”,他们转而祭出川军抗战的大旗,批评东北军在抗战初期的不抵抗行为。一场商业性的赛事与抵抗外侮的抗战并置在一起,看起来是很无厘头的事件,但却是一个极具后革命或后战争时代症候性质的一幕:在经济全球化和消费主义盛行的时

代,抗战并未被遗忘,但人们会在什么情境下忆及抗战,以及大众以何种方式言说抗战,却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长期以来,主流文学叙事中抗日战争正面战场被忽视,国军抗战成为一个少人问津的暗黑区域,活跃在大众视野中的主要是网络文学和电视剧中的相关叙事。如网络小说《特战先驱》(2006年)、电视剧《战旗》(2012年)、《长沙保卫战》(2014年)等,这些作品或者是个人英雄主义式的激情书写,或者套用“革命+恋爱”模式讲述青春偶像的故事,

收稿日期:2016-05-01

作者简介:刘虹利(1983-),女,四川南充人,西南民族大学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这导致战争本身的惨烈残酷程度被降低甚至消解,以无数生命为代价的抗战被成功地转化为消费产品。而网络战争小说从战争历史进一步发展到战争幻想,将穿越、谍战、言情、悬疑等元素杂糅拼贴,如《抗日之我为战神》《开艘航母去抗日》《重生之抗战元勋》等,其娱乐化倾向显而易见,至于那些不断遭遇诟病的抗日“神剧”,就更是把一段本该严肃对待的沉痛的历史“玩坏了”。

## 一 遗忘与偏见

2013年何顿的长篇小说《来生再见》面世,弥补了上述战争叙事的缺憾,是正面书写国军抗战历史的扛鼎之作。作品讲述了“我”的父亲黄抗日20岁顶替哥哥入伍后的经历,他在11年间经历大小战役一百多次,其中三次长沙会战和衡阳保卫战是小说叙事的主体部分。“《来生再见》是写中华民族在最危险的时候,上一辈人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浴血奋战。当年湖南境内打了很多仗,可是上一辈作家由于政治原因不敢写,怕扣上一顶给国民党唱赞歌的大帽子。我若不写,这个题材就没人写了。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前辈,死得都差不多了,至今那些为国家做出过贡献的国军抗战老兵大多都还家徒四壁,这是两党之争而忽视他们的结果,弄得那些国军抗战老兵惨兮兮的,我心里真为他们鸣不平,所以不但写了《来生再见》,还写了《黄埔四期》。”<sup>[1]</sup>应该说,全面、公允地反映历史的努力一直内在于严肃文学创作的领域,1990年代以来,以新历史主义写作为肇始,开始对国共两党二元对立的叙事陈规作出反拨。这些小说重新激活家族史的叙事框架,关注历史夹缝中的另类人物(如土匪),或灵活运用先锋派的叙事技法,对确凿的历史定论提出质疑,使得官方和正统的历史言说由板结走向松动,并在裂缝中生长出新的可能。这其中就包含了对国民党抗日的重新评价,如《白鹿原》中塑造了鹿兆海这个正直的国民党军人形象,徐贵祥《历史的天空》中有令人肃然起敬的国军将领陈默涵。国民党军人从仪表外貌到道德品性的负面书写状况逐渐改善,而通过对个人命运偶然性特征的指认,也使“一入国军即非善类”的本质主义偏见得以改观。当然,文学逐渐开拓边界的勇气来自于环境的渐趋宽松,从1985年起,国军抗战的形象在大陆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再版中一再改观,可以说新世纪以来国军抗战的贡献已获全面肯定,尤其是

2005年9月3日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公开讲话更是对国军正面抗战的最权威认定。尽管如此,主流的严肃文学创作依然呈现滞后的局面,因此,《来生再见》正面切入国军抗日的议题、记录国军在湖南与日本侵略者的具体战斗过程,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来生再见》写作的初衷是抵抗遗忘,一方面,作者要补足没人写的缺憾,“我觉得我辈作家再不写,下一辈作家更不会写。我至少还见过那些抗战老兵,还有感观印象和记忆,下一辈作家没见过他们,自然不会想到要写他们。就像鸦片战争或甲午战争,过去一百多年了,知道的人都死了,不知道的人觉得那是一个遥远的故事了。我出生在新中国,要我去写那些久远的战争,我也没兴趣写。”<sup>[1]</sup>因此小说中叙事人“我”会直接针对“读者”发声,它充分显示作家与读者分享故事的迫切愿望。另一方面,除了依然健在的国军战士面临被遗忘的窘境,和平年代国人的健忘,也使那些牺牲的先烈无处祭奠、英灵无处安放。同时,还原历史、唤起记忆的目的,还在于抵抗公众历史认知上的偏颇,文革期间刘大鼻子审问黄抗日的时候问了一连串的问题:“你这副模样还能打死敌人?”“衡阳还不是丢了,那也算保卫衡阳吗?”“你既然抗日,为什么还向日本侵略军投降?”“为什么你那么怕死?”<sup>[2]</sup><sup>47</sup>如果说历史是成功者写就的,按照成王败寇的逻辑,国军抗战失败,必将直接导致他们的抗战历史沉入海底,面对这样的诘问,黄抗日无言以对,而今天的读者却不得不重新审视这种逻辑的合法性。所以,作品借一个老作家之口,对潜在的历史认知提出了抗议:“谁说蒋介石不抗日?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大会战 and 长沙四次会战、桂南会战、昆仑关大捷和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及衡阳保卫战,还有雪峰山大会战是谁打的,难道是八路军打的?”“这段历史是不能抹杀的,也抹杀不了。”<sup>[2]</sup><sup>22</sup>

## 二 底层与反战

真实地还原和讲述历史,是对历史的尊重,而尊重历史就是尊重生命。在作品中,黄抗日是一个怕死的窝囊废。这个农家子弟文化程度不高,他怕打仗,因为打仗会打死人;他胆小,当不了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他喜欢种田务农,喜欢看着桃子、梨子、橘子一天一个样,喜欢下塘摘莲蓬、挖藕、捉甲鱼,喜欢挖红薯时闻红薯和泥土的味道;他是个没

有野心也不会有出息的农民,没有通过战争晋升为团长、师长荣归故里的想法,甚至当连长都不愿意;在战场上他怕死,被龙营长骂作“胆小鬼,脓包,软蛋”;战后,他的性格依然没有发生变化,他是有口皆碑的老实人,毫无野心,不嗜权力,也不居功自傲,只是小心谨慎地做人做事。当我们把这个人物放到当代中国抗战小说的谱系中,无论怎么看,他都是格格不入、不合时宜的。贺邵俊先生在《穿越战争叙事的铁丝网》一文中认为,“何顿秉承的是一种人民的历史观,他认为抗日战争是一场人民的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何顿所理解的人民,不是在意识形态中被符号化的人民,而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如黄抗日、田矮子、毛领子等。历史其实是千千万万具体的个人写成的,但我们记载历史时仅仅记下了那些叱咤风云的伟人们。我们标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可是我们在进行历史叙事时,并没有体现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理论的精髓。何顿的《来生再见》的意义就在于此,它让我们看到了真正人民历史观的战争叙事,是具有广阔的审美空间的。”<sup>[3]</sup>

在我看来,作家通过对黄抗日底层农民身份的还原,表述的与其说是对人民力量的赞扬和崇敬,不如说是通过对“任何人在战场上都怕死”这一真相的揭露,一步步地揭示战争的残酷,从而达成对战争的反人性本质的揭露和对反战立场的有力表达。“我写此书不是写一部讴歌战争的小说,旨在反战。战争太残酷了,经历过战争的人都晓得这是真的。”<sup>[1]</sup>

战争将无数安分守己、胸无大志的农民卷入其中,他们昨天手握锄头、肩挑粪桶,今天要却要举枪射击、上阵杀敌。正如黄山猫被粗暴地命名为黄抗日,其士兵身份的获得是突如其来的。战争意味着杀戮,黄抗日必须杀死日本兵,否则自己会被对方打死,如果后退,则会被自己人打死。在这样非生即死的特殊时刻,胆小怕事的黄抗日扛枪杀死了一些日本人,有些时候是由于好运气,有些时候是出于本能的反应,有些时候则是受益于战斗经验的积累,而这又有什么好炫耀的呢?更有甚者,胜利可能并不是来自信念的驱使,而是一些更偶然的原因,比如说为了“虎口夺食”——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为了抢夺对方的饼干、干肉而变得分外英勇。正因为杀敌或胜利不一定都有高尚的理由,而投降

和被俘也就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求生,当他们的经验、胆识和勇气在战斗中逐渐磨砺而成时,当他们以顽强不屈的精神赢得对手的尊重时,传统意义上“投降”的道德污名也就不复成立了。“他们从一具具自己官兵和日本兵尸体上迈过去,迈过去时他们的脸上都飘扬着骄傲,不是战败者的自卑或猥琐,因为他们打死了很多人,他们感到满足。他们走到端着枪紧盯着他们的日本兵前面,脸上还是飘扬着傲慢或是那种坚强的表情。他们本来没打算活着走出阵地,现在方军长让他们活着走出阵地,他们个个都面无惧色。”<sup>[2]319</sup>

同时,在浴血奋战的战斗岁月中,主人公并没有成长为更加出色的革命将领或者共产主义战士,他一直保持了下级军官的身份以及胸无大志的心性。这是对战争小说成长模式的一次重大突破:因为若论战争体验,有谁能比临阵杀敌的底层官兵更有切身体会呢!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探究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杀戮问题,他认为这场大屠杀是内在于现代性的官僚组织体系之中的事件,那些日常生活中的正常人之所以能够出色地完成杀戮的任务,在很大程度上是“距离”造成的。“由于是‘远距离地’杀害,残杀与绝对无辜的行为——比如扣动扳机、合上电源开关或者敲击计算机键盘——之间的联系似乎是一个纯粹的理论概念……因此下面的一切都变得可能了,飞行员把炸弹投向广岛或者德累斯顿,在导弹基地分派的任务中表现出色,设计出杀伤力更强的核弹头——并且它们都没有破坏一个人的道德完整,也没有导致接近于任何的道德崩溃……知道了看不见受害者所带来的后果,也许就更能够理解大屠杀的技术水平为什么能够不断被提高。”<sup>[4]</sup>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对于高级将领来说,离开战场几公里、几十公里,这个距离消除了杀人和被杀的直接感受,在战争中建功立业的成就感抵消了伤亡的痛感与屠杀的不适,相反,杀敌技术进一步上升到军事理论的高度,则完全遮蔽了活生生的个体生命被剥夺的事实——要知道军事理论掌握得越好,所杀的人也可能越多。因此,真正成功的反战小说必然以底层战士的战斗体验来穿透雾障,只有在你捅我一刀,我捅你一刀,又同时拔出刀来试图再给对方致命一击,并双双无力倒下时,对战争的生理和心理感受才是同步契合的。小说中描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瞬间:衡阳保卫战期间战斗双方暂时休

战打扫战场,“有个收尸的日本兵走到离黄抗日只有几步远的地方了,双方不但能看清鼻子、嘴巴,还能看清眼睛和目光了。这个日本兵长着个田矮子那样的鸡胸,胸脯上的胸毛向两边散开。黄抗日与这个日本兵交流了下目光,感觉这个日本兵的目光十分冰冷,是那种绝望的冷。”<sup>[2]307</sup>这次零距离观察和目光接触,没有以革命英雄主义的乐观精神作结,没有漫画式地丑化对方、拔高自己,相反,它展示了两个普通的人在战场上相遇为敌的情景,他们互为镜像,完整地映射了战争的残酷真相:“日本人疯了。我们也疯了。”“我们奉命死守,日军却要死攻,自然两边都变得穷凶极恶,都不要命。”<sup>[2]300</sup>因此,黄抗日说“战争是很残酷的。残酷、残酷——残酷!”<sup>[2]300</sup>

所以何顿让小说中的黄抗日永远做一个下级军官和一个普通人。这是尊重事实的选择,“国军一般士兵温驯、有纪律、能吃苦耐劳、服从领导;低级军官对于命令,每能迅速执行;营、团长个别差异极大,不过也不乏优秀之士……至于师长和军长阶层,则是个大问题。”<sup>[5]</sup>同时,如果稍作对比,我们会发现这种安排作为策略更为关键。石钟山的《父亲进城》被改编为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影响甚大,其中的主人公师长石光荣,以受了十八次伤作为骄傲的资本,为了抢夺文工团的女战士琴,子弹上膛,和竞争对手互相嚷着要毙了对方,真刀真枪地在文工团走廊上较量。这种事情永远不可能出现在黄抗日身上,这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农民,势必终身被杀人和被杀的恐惧缠绕。他忘不掉日本兵被打中后抽搐的腿,忘不了被辗压和活活烧死的战友,那些在炮声中飞上天的断臂残肢,那些堆积如山腐烂恶臭的尸体,那些饥饿浮肿受伤病痛和极度疲惫的经历,那一个个怎么也杀不完的日本兵,必将潮水似的涌入他的梦中。而对于石光荣们来说,如何更多地杀人——杀死敌人,已经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是军事素养、胆识智商和经验值的问题,所以在和平年代,他们远离战场无法施展才能,没有机会指挥千军万马杀敌立功,难免落寞,就要把战场上的作风搬到日常生活中来操练。卑微如草芥的黄抗日受到的影响则是在下象棋的时候舍不得齰炮,因为他是战争的亲历者,深知炮对于军队的重要性,因而舍不得浪费。从英勇抗击侵略者的角度看,黄抗日是英雄,是获得了对手尊重的不折不扣的英雄,但最终我们发现,在战场上没有

赢家,“现在的人多幸福啊,爹感叹道,任何不幸都不及战争给人带来的不幸。战争是毁灭人性的。”<sup>[2]99</sup>相比之下,2015年何顿的长篇《黄埔四期》由于书写对象的身份从底层士兵向国军将领迁移,对战争的呈现和反思力度不及《来生再见》,留给读者更深刻的印象反而是这些军人跌宕起伏的人生遭遇。

### 三 结构与张力

除了底层身份还原所带来的穿透力,作者还真实地再现了一群懵懂少年的战争经历。小说中有一段难得的美好场景,春暖花开,蝴蝶飞来,还没脱孩子气的新兵,有的追捕蝴蝶玩,有的采摘桃枝插于窗前,有的站在桃树林里吹笛子。然而这安宁的场景转瞬即逝,在衡阳保卫战中,这些怀揣诗和美、憧憬爱情的学生战士也不能逃避战死的命运,“身为班长的黄抗日想,这都是些乳臭未干的孩子,他们并不知道战争有多么残酷、可怕。在他们白净、英俊的脸上有很多想象,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充满了他们的脑海,不是一只帆而是无数只帆在他们的脑海里飘,因而把战争看成了蜕变的游戏。他们全是未来的人中俊杰,但现在他们还太稚嫩了,嫩得就像豆芽菜,一掐便会断,凭什么批准他们来打日本人?”<sup>[2]217-218</sup>这是对侵略者的控诉,也有有力地批驳了对战争的浪漫化想象。

在和平年代,正确地想象战争和书写战争都非常困难。因此,小说采取了大故事套小故事的嵌套式结构,它的大故事以儿子的视角讲述父亲黄抗日从参军到90岁寿终正寝的一生,小故事以黄抗日的交代材料为蓝本,讲述身为国军下级军官的黄抗日所亲历的厂窖大屠杀、长沙的三次会战与衡阳保卫战。小故事是连贯的、独立的,大故事则打乱了时间顺序、自由跳转,并不断地对小故事进行补充和解释。这种形式避免了过于集中的战斗场面可能带来的阅读疲劳,也使文本在大故事和小故事之间、在虚构和真实之间产生了张力。如果说小故事讲述的历史是封闭式的断代史,大故事则有效地打开了小故事的封闭结构,将之延伸到当下,它是个人的历史,更是群体的历史,它是被书写的历史,更是不断流动和延伸的活的历史本身。这种通史式写作所具有的开放和未完结性质,促使我们拉开距离看历史,在评判是非、抒发感慨的时候多了公允态度和平常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生再见》既

不是民族主义的,也不是民粹主义的。

除了大故事和小故事之间的张力,在黄抗日和黄跃进的角色之间,也保持了足够的张力。黄跃进对父亲的态度并非一开始就是崇敬的,对战争他没有亲历,对国军他也了解不多,他认为买一台日本冰箱不用大惊小怪,反而是父亲这辈人的民族精神太狭隘了:

“报纸上说了,中日人民要世代友好下去。”

“世代友好下去?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是永远不可原谅的。……遍地都是国军官兵和老百姓的尸体。晓得吗?遍地!”

我很木然,没经历过,想象不出那种场面。

“那是战争年代,已经过去了。”

“过去了?我还没死呢。”<sup>[2][31]</sup>

可以说,这两个人物间的对话其实是两个时代的对话,是和平年代与战争年代的对话。黄跃进代表着当下普通民众对抗战历史的态度——战场上的仇恨不可能无限放大、延伸到今天的生活当中,但漠视历史、忘记创痛,更是问题重重。黄跃进和读者面对的问题是相同的:如何在回忆与遗忘之间架起一座浮桥,如何在和平的环境中安放战争导致的极端情绪。一方面,作者让儿子黄跃进站在较为疏离的角度,代表和平年代的读者发声,他陪伴、倾听、阅读和查证相关材料,并不时地发出疑问,这使阅读的过程变成一趟旅程,读者跟随黄跃进逐渐深入黄抗日人生遭遇的深处,最终实现情感的同步转变——从小时候以父亲被俘深感蒙羞,到成年后对父亲的心情感到木然,到生平第一次对父亲产生极大的尊重;从心安理得跟潮流买一台东芝冰箱,到主动拒绝公司里配给的皇冠轿车,读者和黄跃进一样内心渐生崇敬之情,认同了父亲的价值观并被他的精神所感动。另一方面,黄抗日的“非英雄”、普通人身份,又有效地消解了作品的悲剧色彩,消除了煽动过激情绪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亮剑》里李云龙的命运令无数读者同情和悲愤,而黄抗日却启发我们珍惜每个普通人身上蕴蓄着的巨大能量。

生命是宝贵的,“有几年,我反复想过有关死亡的问题,非常想弄明白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会选择死亡或为何要选择死亡。生命是那么可贵,为了能活,爹在强人面前是能低头就低头、能弯腰就弯腰的,心里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活着比什么都好,哪怕这种活着只是苟且偷生。”<sup>[2][79]</sup>黄抗日和毛领子最后一次被日军俘虏的时候,从日本兵脸上猛然看到尊重的表情,“他们尊重这些英勇的中国军人,这些战死和活着的中国军人坚守在衡阳,打得他们束手无策。”黄抗日对毛领子说:“你要是死了,就看不到这些。”<sup>[2][336]</sup>最重要的当然不是作为“他者”的日本兵的认同,《来生再见》的问世、黄跃进和读者的认同,意味着黄抗日和他身居陋巷、晚景暗淡的战友们,终于活着看到了一段隐匿的历史和一群隐匿的人获得了应有的尊重。他在90岁生日的时候被上帝收走,那一天是圣诞节。对于那些不被告慰的英灵而言,书写铭记了他们的历史,这是重生,也是永生。

战争,是一场噩梦。对战争的书写,永远不应该专注于对血腥暴力的猎奇、对宏大战斗场面的渲染、对赫赫战功的炫耀或者对战争合法性的论证,它不是给成功者树碑立传,而应关怀投身战斗的普通人的命运,它不是对狂热激情的宣泄和煽动,而应是一个让后人远离战争的警示,是一次珍视生命价值的善意提醒。《来生再见》是一部内涵丰富的作品,它不仅是国军抗战小说的收获,更是反战小说书写的重大收获,而后一点尤为重要。

#### 参考文献:

- [1] 何 顿,姜广平.我坚持在文学的道路上缓行[J].西湖,2015(8):105.
- [2] 何 顿.来生再见[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
- [3] 贺邵俊.穿越战争叙事的铁丝网[N].文艺报,2014-12-19(2).
- [4] 鲍 曼.现代性与大屠杀[M].杨渝东,史建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35.
- [5] 张瑞德.山河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队战力[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31.

责任编辑:黄声波